丁 志 明

（1913—1991）

丁志明，西安市人。早年在西安中山中学、西安高中读书。1932年4月26日，在参加反对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斗争遭到镇压时，他不顾个人安危，高举大旗继续前进。同年秋西安高中因闹学潮而被查封，丁志明失学。冬，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并负责发行工作。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员。在党组织几经破坏、遭敌追捕的紧急关头，他临危不惧，舍己救人，多次出色完成了任务。

西安事变前，丁志明和北平大学、东北大学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取得联系，在西安学生中秘密发起组织“民先队”。西安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组织进步群众团体——西安地区小学教师联合会，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同时参加西北各界救国会，任执委兼组织科长。在此期间，通过艰苦工作，成立了西安邮局救国会和邮政局工会，发展了一批党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依靠进步员工，用各种巧妙方法，避过国民党军警宪特的严密检查，将大批进步书刊和报纸安全送到读者手中。1937年3月至1938年9月，丁志明先后任中共西安工委委员、长安县新筑镇区委书记。通过救国联合会在杜曲开办夜校、发展党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成立了长安农民救国会，还建立党组织和民先队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战。

1938年10月至1940年，丁志明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东渡黄河到山西，在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十七师和一七七师作党的兵运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先后以少尉、中尉书记官作掩护，团结广大爱国官兵，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作斗争，秘密发展党员。在晋南中条山地区和广大爱国官兵一起，同日军展开多次血战，歼敌万余人。 1941年，丁志明不畏艰险，丢下刚过周岁的孩子，带领几位地下党员和母亲，穿过国民党顽固派设置的层层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不久又将伯父一家引向革命。在延安期间，曾先后进入中共中央党校、行政学院学习。

1942年到1949年4月，丁志明历任中共陇东地委统战部干事、国民党十七军中共工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宁县工委书记、海固工委书记、甘肃工委军事科长、西北局城工部科长等职。在主持十七军工委工作期间，经常深入部队，广交朋友，摸清各级军官的情况，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党在十七军中的政治影响，使十七军与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友好相处。在宁县、海固和西北局城工部工作中，和战友一起积极壮大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机动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断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为西北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丁志明历任市人委委员、市民政局长、市企业局长、市委委员、市委基建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西安市副市长兼市建委主任，并当选为西安市第二、三届人大代表。他为西安市的基层政权建设、地方工业发展、军事工业企业的基建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解放初期对原有各类企业的接收整顿，到一大批骨干企业的建成，无不凝结着丁志明殚精竭虑的心血。为了完成“一五”期间西安地区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丁志明带领工作组，坐阵建设工地，依靠群众出谋献策，组织快速施工，保证质量，开创了基建夜间吊装的先例。在西安钢厂的建设中，他在工地和工人同 吃、同住、同劳动，遇到问题立即解决，半年时间就炼出钢，结束了陕西不能自

己炼钢的历史。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丁志明因所谓“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但他坚信自己是实事求是者，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以党的事业为重，服从组织决定，辞别老母妻儿，独自一人到石泉水电工程局任副局长，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同技术人员、工人促膝谈心，关心干部和工人的生活，受到干部和工人的信任和尊敬。 1962年所谓“右倾”错误被甄别，先后任陕西省经委副主任、省基建委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丁志明又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走资派”、“叛徒”，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但他横眉冷对邪恶势力，坚信对被颠倒了的是非，“历史一定会作出正确的结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特别是打倒“四人帮”后，丁志明的冤案得到平反，历任陕西省革委会机械局顾问、局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经委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兼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等职。并当选为西安市第八届人大代表、陕西省第七次党代会代表、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他不顾多病缠身，拖着“文革”中被打伤的腿，走大街，穿小巷，进棚户，查危房；亲临太华路、南大街等“蜂腰”地段，进行实地调查，心中构想着结合旧城改造，把西安建设成为现代化城市的蓝图。后来，在丁志明的带领下，广大城建职工经过四个春秋的艰苦奋战，建成居民住宅小区10多处，使1.2万多户居民喜迁新居。还领导城职职工拓宽了南大街、太华路、环东路、兴庆路、劳动南路等道路。为按时打通环东路，他说服医生，一再推迟胆囊摘除手术，坚持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没有星期天。手术后从胆囊中取出大小结石335块,医生惊呼“罕见罕见”。

1981年7月，丁志明利用手术后赴外地疗养的机会，组织有关部门向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汇报西安市日益严重的水荒问题，引起了上级的重视，同意西安市开始黑河引水工程的前期准备工

作；其后，在国家计委和省市党政领导的支持下，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黑河引水工程列入了建设计划。

1984年,丁志明离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党的事业,为西安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开放，深化改革而奔走，还积极筹建敬老院等社会福利事业。直至病重期间，还为党和国家取得的每一项成就而高兴，也为极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破坏党风而担忧。1991年12月29日丁志明逝世，终年78岁。

（张守宪梁星亮）

万 建 中

（1917—1991）

万建中，湖北省大冶县人。先后就读于安徽省安庆中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业大学）。1940年7月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8月至1950年1月留学美国，先后获得硕士和农经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万建中于1950年3月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重返西北农学院，历任农经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教务长、副院长、院长兼武功农业科研中心协调委员会主任，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委，中国农经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现代化经济研究会干事长，陕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西北农学院党委常委。

万建中毕生致力于农业教育事业，为我国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的改造和发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担任农经系教授和系主任期间，他多次参加了中央主管部门召开的全国农经专业教学改革会议，充分论证了农经学科和农经专业的特点，以及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师资培训等问题阐述了许多富有影响的见解。两次受中央有关部

委委托，主持召开全国农业经济教学研讨会，为我国农经教育事业的深入改革和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万建中在从事农经教育的40多年中，先后主讲了《农村调查》、《农产品贸易》、《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管理学》、《国营农场管理学》、《农业自然资源经济学》、《农村发展经济学》等课程，招收研究生10余名。他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因材施教的方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讲授内容突出重点，紧密联系实际，重视介绍不同学派的基本观点，扩大学生思路。善于把讲授、自学、讨论、辅导及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万建中在担任西北农学院领导期间，团结全院师生员工，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教育方针，积极开展教育改革，主持制定了学校的发展规划和教学改革方案，创建了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和一批校外试验推广基地，积极改造老专业，增设新专业，使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研究生培养、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全面提高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管理水平和成为农业重点院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万建中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一贯重视科学研究为农业生产服务。他不断探索解决我国农业经济管理问题的途径和措施特别是对西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黄土高原地区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早在40年代初，他就发表了《陕西的农业经营》等论文，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农业合作化时期，他主持制订了《武功县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规划》。 1959年与他人合作编写出版了《烽火十年》一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多次深入西北各省（区）农村实地考察，在完成《宁夏盐池县农村经济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又主持了《盐池县农村资源开发与经济综合发展》的课题研究，主持创建了陕西省乾县农林牧综合试验区。他撰写的《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的研究》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雨养农业的研究》两篇论文，先后在有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和交流，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同他人合作主持的“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布局”的课题，1990年获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优秀成果奖。为了加快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西北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他在对西北五省（区）广泛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将西北地区划分为“西宁—兰州—银川黄河上游经济开发区”等13个经济区的区划新设想，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赞扬。

万建中在担任民盟西北农学院和陕西省的领导工作中，积极带领广大盟员虚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切与共产党的合作，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世界观，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万建中在担任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期间，已年逾古稀，但仍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了搞好人大工作，他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和建议，在身患绝症住院治疗期间，他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仍然关心着省人大常委会和西北农业大学的工作。1991年6月14日，万建中在西安病逝，终年74岁。

（李晓春　李淑英）

方　杰

（1919—1990）

方杰，原名方家杰，笔名仲英。1919年8月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33年入寿县初中读书，并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合肥省立庐州中学高中部。

1937年抗战爆发后，方杰组织寿县学生回乡救亡宣传团，被推选为团长。后带领安徽省青年救亡宣传队，奔赴延安。1938年2月，方杰入安吴青训班干部连学

习，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5月，方杰等5名中共党员由胡乔木派往徐州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二十一师从事战地服务团工作。他们的党组织关系随即转到徐州市委。

1939年春，方杰回到延安，先在抗大学习，后在中央军委后勤部直属政治部工作，担任《部队文艺》编辑。他在《一年间》、《清明前后》等戏中扮演主要角色。他创作了《军民大生产》、《长夜》、《回娘家》、《梢林里》等7个剧本，并参加演出，还撰写了《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之歌》和《歌唱白求恩》歌舞剧的歌词。并经常在《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上发表剧评、杂文、诗歌和通讯。

1945年夏，方杰调到西北文艺工作团，他参加巡回演出，创作文艺节目。在参加绥德县义合一乡土改期间，担任了副组长。他从陕北的苏区历史和实际出发，贯彻党的土改政策和西北局指示，工作稳妥，圆满完成土改任务，受到西北局习仲勋书记表扬。

建国前后，方杰曾任西北局宣传部科长、副处长等职。 1954年至1966年，先后担任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并兼任韩城县委书记、省文教厅副厅长和陕西艺术剧院院长、党委书记。他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大量的宣传和文艺工作。

1964年，在陕南西乡县社教时，方杰不时地把作家、艺术家对农村社教中的一些过火做法的意见及时反映上去，以求有所纠正。他跋山涉水，看望在深山里社教的画家方济众和音乐家关鹤岩，住在山区农民家中的竹席上，吃着吊罐熬的菜汤，深情地说：“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什么时候让人民群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才是干了真事啊！”他还特地批准杜鹏程、王汶石假期，接到城里，给他们创作和休息的机会。 1965年元月，他还来

到成昆铁路工地，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杜鹏程的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在他的支持下，被成功地改编为京剧《秦岭长虹》。

“文化大革命”中，方杰受到迫害。1972年10月至1979年底，他先后任合阳县委副书记、渭南地区文教局长、渭南行署副专员。他勤恳工作，顾全大局，参与领导抽黄灌溉工程的建设，解决了合阳、大荔两县群众用水和灌溉问题。

1980年，方杰重新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认真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对人民文艺事业的一片纯情和对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厚意，特别注意发挥陕西文艺界两个传统的优势，为繁荣新时期陕西文艺事业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领导工作。

1982年，他承担全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在西安颁奖大会的组织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大会获得圆满成功，方杰也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在拍摄电影《西安事变》时，他同剧组一起，研究解决演员、经费、实物和摄影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为挑选演员多次看录像，和导演成荫以及主要演员连续几个晚上看资料片至深夜三四点钟，为电影《西安事变》成功拍摄作出了贡献。

1983年底，方杰受命筹备陕西第二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后当选为省文联驻会副主席，并任党组书记。他在花甲之年，毅然担负起白手起家组建省文联重任。他主持国家“七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间艺术集成》（民歌、民谣、民俗）陕西卷的编纂工作，任编委会主任，他还担任民间文学研究会陕西分会名誉主席、省民俗学会会长和《西北民俗》杂志主编。他跑遍全省绝大部分地、市、县，落实任务，筹集经费，加快编书进度。他还陪同丁玲、贺敬之等文艺界著名人士重返延安视察和参观。

1990年2月6日，方杰在机关工作时，心脏病突发，住院抢救，不幸于5月27日与世长辞，终年71岁。

（宋新勇）

王　瀛

（1902—1927）

王瀛，原名王义昌，字海峰。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城一个小商家庭。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塾、高小、山西汾阳铭义中学、太原省立一中。

王瀛1924年在太原山西省立一中读书时，由傅懋恭（即彭真）、贺昌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青年学会和平民小学的活动，热情向同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参与领导了省立一中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还参加组织领导太原工人罢工斗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5月18日，他同傅懋恭率领山西大学、省立一中、进山中学等校学生几千人齐集太原文瀛公园，举行抗议省督办兼省长阎锡山为扩大军队在城乡征收房税和加重群众负担的示威游行。愤怒的学生捣毁阎锡山的御用组织——山西省议会，包围了省督办公署，不顾军警的威胁，高呼“为民请命”，“取消房税”等口号，并派代表同阎锡山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迫使阎锡山当众宣布：“房税当日取消，已收者全数退回。”斗争取得了胜利。

同年6月，他当选为太原市学生联合会主席。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亲自率领山西大学、省立一中等校学生奔向街头和郊区，向大广群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开展募捐和抵制日货的活动。把募到的捐款1.4万多元及时汇往上海，援助上海罢工的工人。6月30日，他领导出版了《铁面周报》，揭露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与学生的暴行，号召各界群众积极投入反帝

爱国斗争。他还赴榆次市领导晋华纺织厂工人举行了40天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是年寒假，王瀛回到家乡神木县，多次在县城高等小学进行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反对旧礼教的宣传。

1925年底，中共太原地委成立，王瀛任地委委员，还先后兼任地委宣传部部长、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王瀛根据中共太原地委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在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中，积极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11月，国民党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国民党右派分子韩克温、苗培成等妄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夺取省党部的领导权，破坏国共合作，要求王瀛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名单。担任共产党首席代表（又称党团书记）的王瀛，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团结中间派，同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断然拒绝了右派分子的无理要求。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在省党部正式执委中占了 4 名，省党部的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商人部、妇女部等 5 个部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王瀛当选为省党部正式执委兼组织部长，同时还担任了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他利用这两个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发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

1927年 3月12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文瀛公园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大会。 右派分子苗培成利用担任大会主席之机，攻击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王瀛愤然登台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挂羊头卖狗肉，根本不是为了国民革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从来不是为了扶助农工，而是反对农工；不是联俄联共，而是反俄反共；对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背得很熟，就是不去执行，是货真价实的孙中山先生的叛徒。 王瀛的发言受到广大工人和学生的热烈欢迎。

大会之后，苗培成、韩克温恼羞成怒，雇佣了几百名流氓打

手，阴谋冲击和捣毁共产党领导的太原市总工会，王瀛闻讯后，立即调集400多名工会会员保卫太原市总工会，并与共产党员薄书存（即薄一波）、邓国栋等人指挥工人和学生捣毁了由韩克温、苗培成控制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和平民中学校长办公室，召开大会对韩克温进行公开审判，迫使他交代了指挥工贼、雇佣流氓捣毁太原市总工会和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阎锡山在山西公开进行“清党”反共，下令通辑王瀛、崔锄人（太原地委负责人）、朱志翰（王瀛的妻子，时任省党部妇女部长）等共产党员。

为了保存党的干部和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王瀛和朱志翰受中共太原地委的重托，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辗转到了武汉。遵照瞿秋白的指示，他们二人立即返回山西转入地下工作。王瀛把中共中央拨给山西党组织的经费5000元汇到山西解州某钱庄，让朱志翰将汇票藏在鞋底里，然后绕道上海、天津、北京、大同返回太原。是年8月，途经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送到太原。

阎锡山闻讯抓到王瀛，如获至宝，下令对王瀛夫妇软硬兼施，一定要从他们口中得到山西地区共产党的重要情报。王瀛被捕后受尽酷刑，但宁死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他对爱人朱志翰说：“这一次我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精神上早作好了一切准备。死了我一个人没有关系，我们的人多得很。看吧，将来总有一天我们的刀子会放到他们的脖子上的。”10月11日，王瀛临刑前，愤怒地斥责敌人“你们杀害我，杀害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但是，你们杀不完。在中国，革命者到处都是，共产党人越来越多！”最后，高呼“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打倒军阀阎锡山！”“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5岁。

（长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 化 民

（1900—1969）

王化民，又名王松年，曾用名肖玉秀、王化南、王升平。1900年出生于陕西华县大县乡算王村一个贫苦农家。幼时只读了两年小学，1912年，伯父病时，父亲和哥哥出外谋生，12岁的王化民在祖母的带领下，跟伯母、母亲、嫂嫂共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尽管一家人在劳碌愁苦中艰难度日，王化民求知的欲望却埋在心里。在劳动之余，他不顾疲劳困乏，和《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戏本结下了不解之缘，被岳飞等英雄人物的民族气节深深感动，很想学一套本事，以图报国为民。

1923年7月，王化民带领算王村的群众揭露本村“官人”（旧时的村长）乱摊滥派的罪行，清出其贪污烟款160块现洋。不料，“官人”不但不退赃款，反而把王化民告到高塘大恶霸、民团团长孙景福那里，诬陷化民拖欠烟款，聚众闹事，民团遂将化民关押起来。父亲见王化民受罪，只得咬着牙借了60块现大洋给民团，化民被放回。年轻的王化民岂能咽下这口恶气，就和好友王占平商量，决定报仇。遂冲到“官人”门口，出手就狠狠地打了官人两个耳光，不等“官人”还手，王化民抡起木棍痛打不休，“官人”连爬带滚逃走。

1926年12月，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回陕的杜松寿、霍世杰、王述绩来到华县开展农民运动，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王化民被党组织选送参加学习，初步接触了革命理论，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回当地积极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2月，经王广录、霍世杰介绍，王化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月，中共算王村党支部成立，王化民任组织委员。加入党组织后，王化民斗争的方向更明确了，意志更坚定了。积极领导农民群众反对地主豪绅的苛捐杂税，清算出豪绅郭锦臣一伙贪污款6000多元，郭锦臣开

始拒不退款，王化民发动群众，将郭锦臣捆绑起来，押到高塘街游行斗争，豪绅们乖乖地退出了赃款。 9月，在中共华县县委扩大会上，王化民被选为县委候补委员。

1928年1月4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王化民被选为省委常委。2月16日，国民党华县县长段紫光派了4名恶差到高塘逮捕了中共华县县委农委委员东日曙，王化民知情后，立即和中共高塘小学支部委员尚贤商量，带了9名同志，埋伏在恶差进县必经之地，当恶差进入伏击圈后，10多人猛然动手，打得恶差抱头就跑，救回了东日曙。是夜，省委派王述绩通知化民去西安开会。17日，王化民和述绩到了西安。在18日晚至19日早召开的第二次省委扩大会议上，王化民同潘自力、张金印被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陕西代表团的代表。 2月22日，3人赴上海参加党的“六大”，后因环境变化，中央决定“六大”不在上海召开，并推迟时间（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莫斯科举行，陕西代表团留在团中央工作的张金印出席）。他们在上海期间，向中央汇报了工作，参加了中央对陕西工作指示的小型会议，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等领导同志的接见，王化民听了中央关于“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示，心里非常激动，决心回来立即开展武装斗争。 4月3日，王化民由沪回陕。其时，省委已决定将渭南、华县作为武装暴动的中心区域，并在华县药王洞小学成立了中共陕东区特别委员会，专负起义之责。王化民一到家乡，迅速投入到渭华起义的斗争之中。为了加强武装力量，他按照省委和东特委的指示，于4月5日和薛自爽等带领渭华两县一批党团员秘密赴洛南县三要司许权中（共产党员）旅接受20多天的军事训练后，带着28支枪、114颗手榴弹于4月下旬返回渭华，成立了陕东赤卫队。

1928年5月初，渭华起义进入高潮，高塘原上各村纷纷成立

苏维埃政府，开展反霸斗争。 王化民担任了算王村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委员。 5月 4 日，高塘镇召开了群众暴动大会，王化民主持大会并讲话，号召群众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会后，王化民带领群众举行武装游行，首先捣毁了恶绅薛良臣的商号——维盛源，烧了帐簿，分了财物。5月7日，王化民和陕东赤卫队一起参加了渭南白庙的群众暴动大会，得知国民党冯子明旅的两个连偷袭会场的消息后，他和赤卫队员们悄悄绕过去，从背后向敌人猛烈开火，把偷袭之敌打得狼狈逃窜。 5月下旬，陕东特委决定王化民代理中共华县县委书记。 特委书记刘继曾要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刘继曾化装成一个留着长胡子的医生，骑在毛驴上，王化民牵着毛驴装扮成请医生的农民，经渭南西原、临潼新丰，走出敌人围剿区域，安全到达省委。等王化民从省委回到高塘，敌人以三师之众已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王化民随起义部队同敌人开展了殊死的战斗，终因众寡悬殊而起义失败。

渭华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清乡团“血洗”了高塘原。算王村是“血洗”的重点村，90位共产党员、赤卫队员惨遭敌人集体杀害，烧房70多间，王化民家的财物被抢劫一空，房屋全被烧光，母亲被逼迫改嫁，父亲沿门乞讨，妻子被撵出门外，王化民无家可归。1928年7月17日，他翻山越岭，赶到临潼新丰赵家村共产党员刘俊义家隐蔽，等待省委通知。连等数日，不见音信，王化民只得在附近打短工，继续等待，直到年底，仍未见省委来人，从此，便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无奈，王化民再次进入秦岭，赶到镇安穆王坪，改名肖玉秀，以造纸工人身份隐蔽起来。

1930年12月，中原大战结束，杨虎城部进入关中，陕西形势有所缓和，王化民从镇安县又来到临潼刘俊义家，改名王化南。1931年9月，从临潼回到家乡，找到王占平一起到西安，在王尚德（共产党员）办的文化报馆任庶务员。 1932年2月，潘树藩

（潘自力之弟，和化民同乡，一起参加渭华起义）来报馆见了王化民，重新恢复了王化民的党组织关系。8月，王化民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改名王升平，和同志们一起，准备借中山中学举行开学典礼的机会，冲击国民党省党部，因被敌人发觉而失败，王化民在西安难以立足，9月回到家乡。适值这年瘟疫流行，王化民的妻、嫂、弟及小女4人丧生，而王化民却未动初衷，继续为党工作。

1933年3月，中共渭华县委书记赵应魁（后叛变）到高塘与王化民联系，王化民和高塘地区的地下党员赵桂贤、赵步肖、宋宗微、陈居义等开展秘密活动。7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王化民和这些同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千方百计营救了红军指战员，使刘志丹等人及时脱险，顺利回到陕北。

1936年5月王化民经王尚德推荐在泾阳水利会运输队赶大车。12月西安事变爆发，王化民又参加了西安各界抗日救国会。

1938年，王化民先到西安天合打短工，后到渭南民运会工作。1939年2月，经潘自力介绍到延安“抗大”学习。在抗大，这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讲课，学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知识，毕业后，经请示领导同意，回地方工作。

1940年3月，王化民和刘进雄在高塘开报馆，常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订购刊物，积极发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老百姓报》，1944年11月，国民党特务查封了报馆，王化民又到西安暂避。1945年2月，在大荔同州师范任庶务员。1946年2月，终因劳累奔波过度，一病不起，结果留下了摆头、跛脚的后遗症。

1949年5月23日，华县解放。24日，王化民闻讯，拖着病弱之体积极参加了建立新政权的开创工作，先后任副区长、供销社

主任等职，勤勤恳恳为党工作。 1969年6月病故，终年69岁。

（任尚勤 邵拉雄）

王 友 直

（1902—1992）

王友直，字正卿，陕西韩城人。1924年在上海大学学习时加入共进社、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国民党。次年“五卅”运动期间，参加过上海工人运动和由上海总工会组织的几次罢工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由党中央派赴苏联学习，并转为联共党员。 1928年毕业后，担任苏联远东边疆苏维埃政府少数民族部副主任兼伯力市苏维埃政府少数民族部主任。1930年在列宁学院做翻译工作。 1931年在周恩来帮助下回国，被党组织安排在江苏省委上海浦东区担任区委组织、宣传部长。1933年由于上海党组织遭破坏被捕，关押至1934年。出狱后和党失掉了组织关系。曾在南京《中国日报》社当过编辑，又在中央陆军学校星子特训班任政治总教官。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友直回到陕西，任陕西各界抗敌后援会主任秘书兼第十战区抗敌动员委员会秘书处长。 1940年调天水行营政治部任少将组长，不久又兼任了兴国中学校长。 1944年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47年7月1日任命为西安院辖市市长。

王友直早年加入党组织，脱党以后曾做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但在周恩来的教育下，他在政治上始终坚持两点：一是决不反共；二是不打内战。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的诺言。如1944年担任陕西省政府教育厅长时，曾不避风险大胆地起用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像徐梦周、崔孟博、武伯纶、马宏山、董汝诚、郑伯奇、李敷仁、曹志麟等分别在教育厅和其下属部门工作。在西安市长任内，他尽量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设法营救、保护和帮助一些革命同志及其家属。1949年3月由他保释王释

奇（“西情处”主要工作人员）、陈久斋等人出狱。他还每月派崔孟博（地下党员）给一些进步人士如杨子廉、李象九、师子敬等送面粉，给王菊人、南汉宸的家属送钱物，进行多方照顾。

1948年9月，西安市银行经理田一明约王友直在南马道巷家中与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见面，他们原是上海大学的同学。这次王友直与王超北的会晤，使他恢复了与党的关系，而且在党的安排下，为了迎接西安解放，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扩编了民众自卫总队，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任命早在1946年就与王超北建立关系的闵继骞为少将副总队长，使这支武装力量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以后在解放西安过程中，对接守西安城防，保护人民和国家财产安全，起了一定的作用。西安解放前夕，王友直被胡宗南裹胁至四川。他在离开西安前，对迎接西安解放做了必要的安排，任命进步人士、市政府参事冯树人为代理市长，并和冯树人、崔孟博、闵继骞商议，将市政府保存历年没收来的特货一大箱，当面打开让大家检查后加封，连同1000元银币交闵继骞，秘嘱其交王超北。并将他私人的美制收发报两用机和小卧车也一并交王超北使用。还特别嘱咐闵继骞要大力保护好档案，原来早在1949年3月，王友直就命令市政府地政科长赵世俊（地下党员）将市政府主要档案加以整理包装，全送到王的家中，筑了夹层墙壁存放，派专人保管，以俟解放完整无缺地交给人民政府。还叮嘱闵继骞要尽力保护公共财物与人民的安全。

王友直到四川后，还为党作了不少工作，如策动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师长吴楷、新五军军长徐经济、新八军军长杨显、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起义，并劝说陕西高等法院院长郗朝俊和省参议会副议长党积龄把档案移交人民政府。策动陕西省公路局局长孙福祜将所带的汽车全部移交人民政府。成都解放后，他曾面谒贺龙司令员，书面汇报了他在四川的这一段策反工作，得到贺龙的嘉勉。不久奉命帮助杨拯民做护送杨虎城将军灵柩回陕的工作 195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